

安徽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殷商与西周陶文研究

姓名：徐正磊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指导教师：徐在国

2010-05

摘要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而产生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文字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有一个由萌生至成熟的过程。从考古发掘和文字考释的角度看，商周及史前陶器上的文字更接近汉字的原始形态。大量的陶文资料随着考古遗址的发掘而出土，这些原始的文字符号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本文对殷商与西周陶文资料进行穷尽性地收集，将收集到的陶文资料和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字形相比照，在此基础上对殷商及西周末释或误释的陶文进行释读。同时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殷商与西周陶文在汉字产生、演变、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

论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所出殷商与西周陶文资料的著录与研究情况介绍。分三个部分，其一，介绍殷商陶文出土情况；其二，介绍西周陶文出土情况；其三，殷商与西周陶文资料研究情况简述，主要介绍学者们研究殷商与西周陶文所取得的成果与不足。

第二章殷商陶文研究。对出土殷商陶文进行释读，介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学者们误释、错释和有争议的陶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章西周陶文研究。对出土西周陶文进行释读。主要是介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学者们误释、错释和有争议的陶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四章结语。总结全文

关键词：字符 陶文 汉字 殷商 西周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result of the human society which is developed to a certain historical stage, from barbarism into civilization. Just as everything else, it has a process of appearing to developing, and budding to maturing.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xegetical point of view, the characters on pottery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y and the prehistoric pottery characters are closer to the original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large amount of the characters information on pottery appeared on excav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se primitive symbol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lthough scholars paid great attention on studying the pottery characters of Shang and XiZhou dynasty, they also have been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due to the limited characters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is very difficult, a lot of characters can not be accurately interpreted, and are highly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Chapter I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ttery characters excavation of Shang dynasty which is developed separately by its exploring tim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cholars' studying about it, especially on their achievement and shortcomings.

Chapter II is about the studying of pottery characters in Shang dynas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 newly pottery characters excavation. The results of scholars' researching are mainly introduced in this part, and meanwhile the writer gives his own opinions on scholars' misinterpretation, wrong interpretation and controvers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ttery characters.

Chapter III is about the studying of pottery in Xizhou dynas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 newly pottery characters excavation. The results of scholars' researching are mainly introduced in this part, and meanwhile the writer gives his own opinions on scholars' misinterpretation, wrong interpretation and controvers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ttery characters.

Chapter IV Conclusion. Summary Full Text.

Key words: Character; Pottery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Shang Dynasty; Xizhou Dynasty.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徽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徐正磊 签字日期：2010 年 5 月 15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安徽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徐正磊 导师签名：徐永刚
签字日期：2010 年 5 月 15 日 签字日期：2010 年 5 月 15 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引言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而产生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文字也应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有一个由萌生至成熟的过程，有一个由单一表义向系统文字过渡即日臻完善的过程。众所周知，商代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时代最早的汉字资料，但它不是最原始的汉字。因为甲骨文本身已很成熟，它的结构既有象形字、会意字，并且出现了利用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从考古发掘和文字考释的角度看，商周及史前陶器上的文字更接近汉字的原始形态。尽管对史前陶文、陶符的性质学术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 5500 年左右的历史了”。但是，这些陶文、陶符与汉字的渊源关系，应该受到肯定。

本文主要是对殷商及西周陶文进行研究，以考古发掘所出土的陶文资料为研究对象。把收集到的陶文按殷商和西周时代先后分类，将陶文拓片进行编排、综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做出评价、提出笔者的观点。最后将殷商与西周陶文放在汉字的发展史中来考查它，希望能给殷商与西周陶文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发现这一时期陶文应有的文字学的价值。

第一章 殷商与西周陶文概述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很多地下文化遗物，为对中国古老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下面介绍一下这些年来考古发掘工作中所获得的殷商与西周陶文资料情况，以及关于这些陶文资料的研究情况。

1. 殷商陶文出土情况

1928 年至 1937 年对殷墟进行了 12 次发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发掘终止。这一时期出土陶文共 82 件，其中每件陶器刻一字数量最多，计 70 余件，刻一字以上少见，只有几件。新中国成立后 1958 年至 1959 年对殷墟的发掘只出土 3 块带字陶片，都是在陶器烧好后刻上去的，字迹多模糊不清，其中只有一“良”字保存较好^①。

1953 年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尊口沿有刻划符号，其中多数是陶工为标注某种事物而刻的记号，有些近似甲骨文中的数目字^②。

1952 年至 1955 年河南省博物馆对位于河南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进行发掘，获得有字陶片 8 片，共 9 个字符，其属于商代早期文化遗址^③。

1956 年 5 月至 1957 年 8 月河北省文化局对河北省邢台曹演庄遗址进行发掘，在商代层发现 2 片刻有陶文的陶片，有 2 个字符^④。

1959 年 12 月上海市西南方马桥镇东遗址被发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分别于 1960 年、1966 年对其进行发掘，获得大量陶文字符。其中第四层文化层属于商代中晚期，并获得 47 个陶文字符^⑤。

1960 年至 1964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对位于偃师县西南 9 公里的二里头村南进行八次正式考古发掘，获得陶器遗物中有刻划符号共 24 种，大致属于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这些符号是否是文字还有待进一步加以探讨^⑥。

1973 年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在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的发掘中，获得了 12 片有刻划文字的陶器残片^⑦。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③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58 年第 4 期。

^⑤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1 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 5 期。

^⑦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79 年第 6 期。

1973年冬至1974年秋，先后对江西省清江县吴城村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在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的器物中，有38件器物上刻有66个文字，很多是刻在陶器底部的^①。

1974年7月至1975年四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位于河北省磁县西南漳河北岸下七垣遗址进行发掘，获得陶器残片上刻有陶文或记号。其中属于商代早期的有字陶片2片共2字符，属于商代中期的有字陶片9片共9字符，属于商代晚期的有字陶片2片共2字符^②。

1986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位于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南，殷墟重点保护区中重要遗址之一的花园庄南地进行发掘，经过三次发掘获得带字陶片6片共8字^③。

1987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安阳小屯村东北地遗址进行发掘，获得陶器朱书文字共6字^④。

1989年发现小双桥遗址，199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工作站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1995年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合作，对小双桥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地调查和大规模的发掘。获得陶文刻画字符7片，共7字符，同时发现了朱书陶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⑤。

198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等单位组织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进行发掘，获得有文字陶片18件^⑥。2001年福建省博物馆、漳州市文物管理办等单位对位于漳州市区东北郊的虎林山商代遗址进行发掘，获得刻有字符陶片8片共8个字符^⑦。

1998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长江北岸的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柳林溪遗址进行正式发掘，获得商代有字符陶器残片共64字符^⑧。

^①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⑥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⑦ 福建博物馆、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福建漳州市虎林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2期。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8期。

2000 年至 200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安阳孝民屯东南地商代铸铜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一批刻字陶范，其中数字范 4 件，文字范 8 件，铭文芯 1 件^①。

2003 年至 2004 年安阳市殷墟孝民屯考古队对孝民屯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获得 2 片带字陶范，有一“大”字和 6 个数字陶文^②。

2. 西周陶文出土情况

1959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流域考古调查发掘队在陕西境内的渭水流域作了一次考古调查，在位于武功县西部大柴家咀遗址中获得陶文符号 1 字^③。

1979 年春至 1980 年春，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建筑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建筑基址时，发现了有刻划符号和文字的陶器残片和瓦片，共计 84 片^④，其中 31 件刻于陶器上，53 件刻于瓦片上。由于有些陶片和瓦片字迹不清，有些为符号，本论文选陶片和瓦片共计 54 片。

1980 年 6 月及 10 月，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在对山西洪洞县永凝堡西周墓葬进行发掘中获得陶文 1 字^⑤。

1981 年秋，莱阳县文物普查小组在县城以南 35 公里的前河前村征集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盨。陶盨上有陶文十几个字，部分字形模糊不清^⑥。

1987 年 3 月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和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组成文物普查队，在平阴县内进行文物普查等工作，获得西周陶文 1 字，此字是方形阴印陶文，戳印在陶豆盘底，字形不清^⑦。

1991 年 10 月至 1992 年 12 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进行发掘，获得陶文刻划字符 1 个^⑧。

1997 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纱厂西路五女冢村附近发掘清理了两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在其中的一个墓葬中出土了一陶罐的肩和底部均刻划有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 年第 3 期。

^② 安阳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 2003~2004 年度发掘》，《考古》，2007 年第 1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流域考古调查发掘队，《陕西渭水流域西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6 年第 7 期。

^④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9 月。

^⑤ 陕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 年第 2 期。

^⑥ 李步青、吴云进，《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盨》，《文物》，1987 年第 10 期。

^⑦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阴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文物》，2001 年第 5 期。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3 期。

符，共 2 个字符^①。

3. 殷商与西周陶文研究简述

一直以来，甲骨文都被公认为是汉字的源头，但这一观点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质疑。无论从字数、字形、词类还是组合方式来看，甲骨文都更趋向于规范的、成系统的文字，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把甲骨文看作汉字的起源是不合适的。而从上个世纪以来先后出土的带有刻划符号的陶文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不少学者认为陶文就是汉字的起源。比如，仰韶文化出土的陶文。仰韶文化指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日、垣头、长安五楼、阳萃野以及铜川李家沟等地出土的遗址，距今 6000 多年。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的若干问题》、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等论文一致认为半坡陶文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国有文字的历史已有 6000 年之久。王志俊先生通过对仰韶文化中的陶文进行形体上的比较，来证明它们确属同一个符号系统，进而通过对这些符号的使用地理范围的考查来证实这是一种文字，并对一些半坡符号进行了考释。

对齐陶文的收集和研究首推陈介祺，陈介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发现齐陶文，是研究齐陶文的第一人。他个人藏古陶七十余器、残陶文近五千片。而收集陶器陶文主要集中在光绪三年至五年间（1877—1879）。“光绪六年（1880）正月曾作联语：‘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附记中言‘忽于齐鲁得三代文古陶数十器暨残陶文四千种’，光绪九年（1883）又在其后记‘陶文兮将及五千，癸未’”（罗振玉《秦金石刻辞·自序》）。

孙洵在《漫谈陶文与“古陶文”》：“可以概括地说，自陈介祺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有以下四个内容：1. 著录，这一时期国家与私人所藏拓片而成书者约 40 种；2. 考释，对个别古陶文作过一些考释，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者，如吴大澂、方濬益、丁佛言、强运开、黄宾虹等人；3. 考证，深入研究者，如唐兰、张政烺先生结合史料对两种齐国陶文作了考证；4. 集录，1936 年顾廷龙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这个领域的工具书《古陶文彙录》”。^②

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陶文，为陶文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今相继在殷墟、郑州二里冈、河南南关、河北邢台曹演庄、上海马桥、偃师二里头、藁城台西村、江西清江吴城、

^①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96 年第 7 期。

^② 孙洵，《漫谈陶文与“古陶文”》，《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7 年第 5 期。

河北省磁县西南漳河北岸下七垣、小双桥、江西新干大洋洲、漳州市虎林山、河北省秭归县茅坪镇庙河村柳林溪、陕西武功县西部大柴家咀、陕西岐山凤雏村、山西洪洞县永凝堡等发掘了殷商及西周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的陶文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发表在各大期刊杂志上的考古发掘报告及调查简报等。比如，《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陕西渭水流域西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6年第7期）、《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8期）、《福建漳州市虎林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2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等，这些考古发掘报告及调查简报为我们提供了原始的陶文资料。

同时学者们对考古发掘的陶文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成果以及陶文著作。196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了金祥恒的《陶文编》，这是陶文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明先生是一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注意搜罗、梳理陶文拓片，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明先生的《古陶文汇编》一书，此书是其历年心血的杰作，《古陶文汇编》共收有2622张拓片，极大地推进了陶文研究。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明、葛英会二位先生的《古陶文字征》一书，据《古陶文字征》的《编辑序言》统计，该书“共收陶文一八二三字，其中正编一一九六字，合文六四字，附录五六三字。”2006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恩田先生的《陶文图录》一书，此书是作者十数年心血之作，全书分为十卷，装成六册，共收入拓片12000余件，可以说到目前此书规模最大、收录拓片最多，其中许多拓片十分珍贵。2007年齐鲁书社出版王恩田先生的《陶文字典》，此书是专门为查找《陶文图录》而编的工具书，极大的方便了读者的查阅。

尽管对陶文的研究比建国前取得了进步，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学者们大多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文，对殷商与西周陶文研究相对薄弱。原因主要是出土的殷商与西周时期陶文资料少，分布较为零散。学者们研究的成果发表在各大杂志刊物上，其主要是对陶文理论性的研究以及文字的考释。

比如，其一，有关陶文和陶符的定性问题的讨论，以及陶文陶符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高明先生在论文《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06期）中对陶符与陶文进行区分，从理论上为我们分析了什么是陶符、什么是陶文，二者区别何在。他说：“……陶符与陶文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纵然文字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符号，但它涵有词义和读音，与一般符号有本质的差别。陶符只能起到一种标记的作用，不能代替文字，陶文才是真正的汉字，二者之间既非一脉相承，也无因袭关系，根本是两回事情。我们这一看法，无论从理论或实物资料的使用都有充分的证据……”，^①高明先生列举了四个方面来论证陶符不是文字以及陶文与陶符的区别等问题。高明先生在论文《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学术集林，卷二，1994年）进一步论述了符号、图像与文字三者的区别，为我们进行陶文研究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具有重要意义。此类论文有陈炜湛《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669—717页，1986年12月）、刘正英《从半坡陶文看汉字起源》（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张敏《从史前陶文谈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龚敏《陶文、图腾与文字的起源》（攀枝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曹定云《中国文字起源试探》（殷都学刊，2001年第3期）、王恩全《中国汉字的形成及演变规律之考辨》（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包和平、黄土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

其二，有关殷商与西周陶文考释与研究方面的论文。这类论文相对要多一些，大都是对所发掘考古遗址的陶文进行考释。如刘一曼在论文《殷墟陶文研究》（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46—361页）中

^①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06期，第53页。

从资料概述、内容分类、族名或人名的考释、文字特点、与藁城和西周所出陶文的比较、殷墟陶文研究的意义六个方面来研究殷墟陶文。她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将殷墟陶文从内容上分为六类，即数字或符号、位置符号、族名或人名、记事、卦辞、其他。这种分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陶文，值得学习和借鉴。李孝定《小屯陶文考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1986年，第305—33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等一些文章对殷墟出土的陶文进行了考释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殷商和西周陶文进行考释的文章还有很多，赵峰《清江陶文及其所反映的殷代农业和祭祀》（考古，1976年第4期）、徐锡台《西周陶文试释》（人文杂志，1985年第3期）、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第3期）、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陶文考释》（文博，1987年第3期）、牛济普《河南陶文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文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姚生民《淳化县出土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李西兴《淳化县发现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文博，1990年第6期）、李学勤《西周筮数陶罐的研究》（人文杂志，1990年第6期）、葛英会《古陶文释丛》（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何琳仪《古陶杂释》（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裴明相《郑州商代陶文试释》（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1993年，第216—225页）、徐锡台《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数图形画研讨》（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蔡运章《商周筮数易卦释例》（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

他们都对殷商与西周陶文资料进行了收集、讨论和研究，在释读陶文和陶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深入地探讨，为殷商与西周陶文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继续研究这一时期的陶文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殷商陶文研究

殷商陶文资料大致按照商代早、中、晚期来编排，同时参考各发掘报告对文化遗址时代的说明，以及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①一书中对殷商文化遗址的分期顺序来编排。

一、出土商代陶文拓片及考释

1. 江西清江吴城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②、《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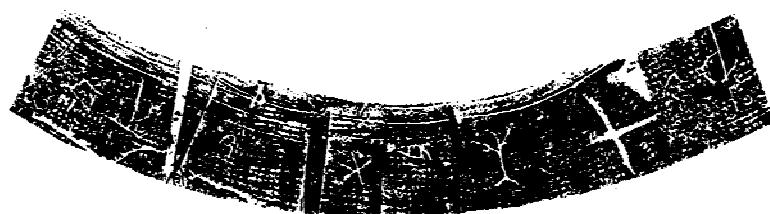
(1·1)



(1·2)



(1·3)



(1·4)



(1·5)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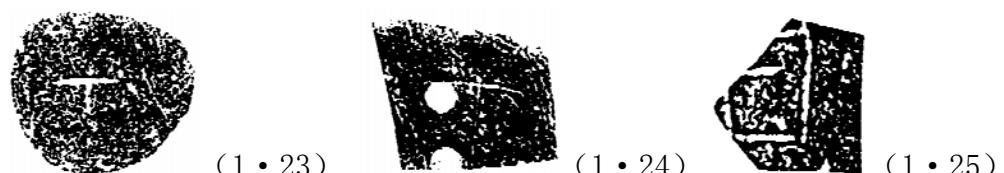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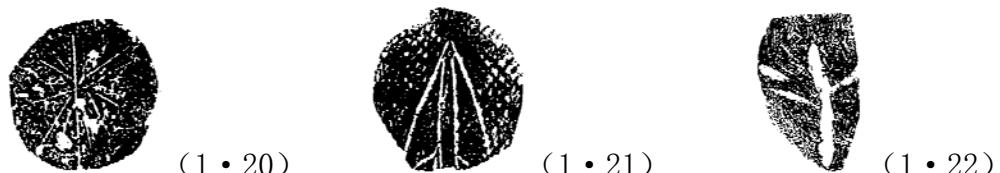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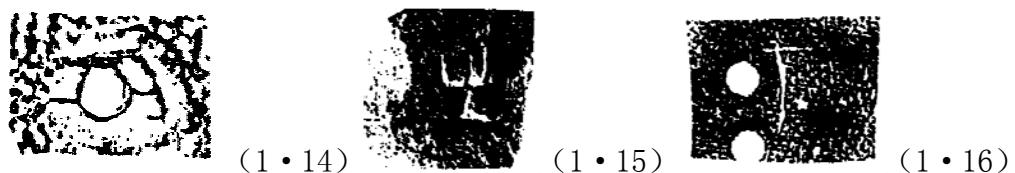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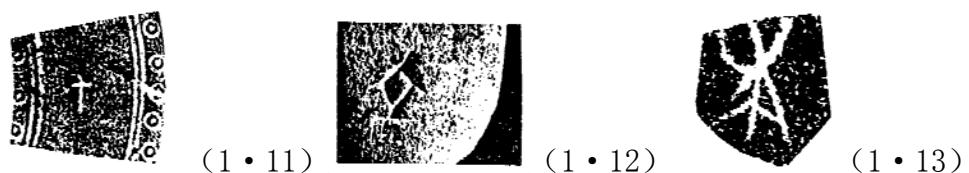


(1·7)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② 王恩田，《陶文图录》，齐鲁书社，2006年。

③ 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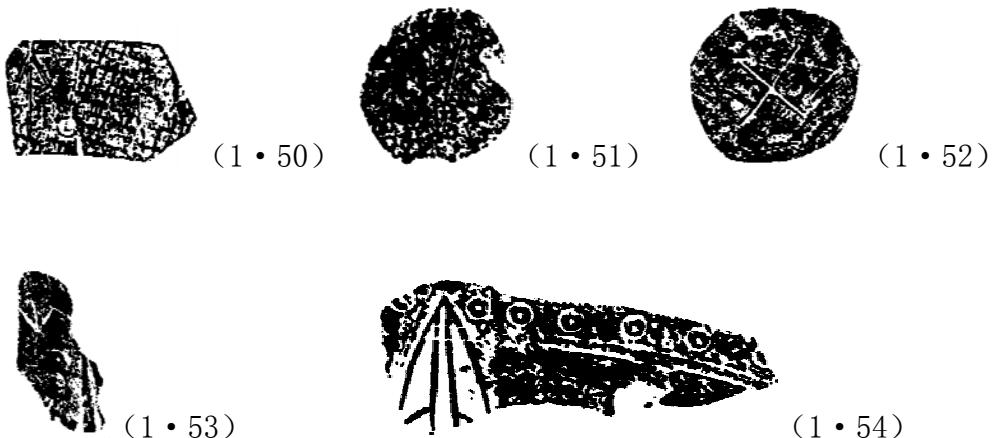
(1・47)



(1・48)



(1・49)



陶文考释。

王恩田先生释为：“口土口田”。第一字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入”，^①李学勤先生^②、萧良琼先生^③、高明先生等都从此说^④。何琳仪先生说：“应释‘匚’……陶文‘匚’可读为‘匍’，‘匍’从‘匚’，‘甫’为叠加声符。”^⑤按，释为“匚”合理，详见何琳仪《古陶杂释》。第二字 唐兰先生：“可能即且字，商代常用且来代表祖字”。^⑥高明先生释为“土”字，他说：“陶文土字写作 ‘’，与早期甲骨文相似，帝乙时代的甲骨文则改作 ‘’，(*粹*907)，西周金文皆沿用晚期字形演变为 ‘’，(大孟鼎)或 ‘’(召卣)。商代陶文与早期甲骨文均保存了原始字形。”王恩田先生亦释为“土”。按，此字形应释为“土”。第三字 唐兰先生释为“帚”，“卜辞文字常用洲帚作𠂇字”。^⑦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禾(或𠂇)”。^⑧何琳仪先生认为此字“”与小篆“”形体吻合，隶定“尤”，“又”、“尤”为一字分化，故陶文“尤”可读“有”。按，以上三种说法以何琳仪先生较合理，但此陶文拓

^①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四期，第76页。

^② 李学勤，《新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

^③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𠂇”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3页

^④ 高明，《商代陶文》，《殷墟博物苑刊》，1989年8月。

^⑤ 何琳仪，《古陶杂释》，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四期，第76页。

^⑥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3页。

^⑦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3页。

^⑧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四期，第76页。

片不清，摹本或有误，此字待考。第四字  释为“田”。

此陶文拓片释读一直有争议，有的学者自右至左释读，读作“入土弔田”。李学勤先生主张自左向右读为“弔田人土”四字，并猜想“弔”是个地名，“田人”即官名“甸人”，“土”是人的名字，是陶钵的所有者。^①后来李学勤先生在《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一文说：“‘甸人’是管理郊外的田野的官，这件钵是他祖庙所有”。^②萧良琼先生也主张从左向右释读。^③按，如何释读还有待商榷。

1 · 2  王恩田先生释为：“□月□□六歲于”。第一字  不

识。第二字  释为“月”。第三字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

“己”，^④按，应释为“巳”。第四字  不识。第五字  释为“六”。第六字

 王恩田先生释为“歲”，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若”。^⑤按，

释为“歲”较合理。第七字  释为“于”。

1 · 3  不识。

1 · 4  王恩田先生释为：“中七木

目□且之□”。李学勤先生认为“可试读为‘弔臣燎豆之宗，仲，七。’……是‘弔’地一个叫燎臣的人的祭器”。^⑥后来他认为“主要的文字可读为‘弔相且（祖）之

① 李学勤，《新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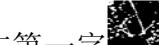
②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年第1期。

③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弔”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3页。

④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四期，第76页。

⑤ 同上。

⑥ 李学勤，《新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6月。

宗，仲，七’。相也是官名，者件罐是其祖庙所用，仲，七‘则是编号’”。^①萧良琼先生认为“可释读为‘中宗之豆，燎臣𠂇，七’。‘中宗’在甲骨文中，据王国维考证应是仲丁之子祖乙。……那么，这条陶文便可解释为祭祀祖乙的祭器，燎臣是官名，𠂇是地名或人名，即𠂇地的燎臣，或燎臣名𠂇。……燎臣是专司燎祭的臣，七十祭器的数。燎与目（臣）相距较远，不能释为一字。”^②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将其摹写为十二个字。释为“己宗之祖𠂇木木目禾（或妇）甲𠂇中”。^③按，其中有八字较清楚，从左往右第一字^{1·5}释为“中”，第二字^{1·6}释为“七”，第三字^{3·7}释为“木”，第四字^{3·8}释为“目”，

第五字^{1·7}字迹不清、第六字^{1·8}释为“且”。第七字^{1·9}释为“之”，第八字^{1·10}释为“宗”。

1·5 释为“安”。

1·6  3·7  3·8 各一字不识。

1·9 释为“左”。

1·10 唐兰先生：“在铜器里有一个簋上有^{1·10}字（见《三代吉金文存》卷六，页四），下半就是这个字，应释为曲。《说文》作^{1·10}，象用竹或柳条、蒲苇等编成的筐的样子”。^④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其”。^⑤王恩田先生释为“齒”。

①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奇迹》，文物天地，1991年第1期。

② 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𠂇”与商朝南土》，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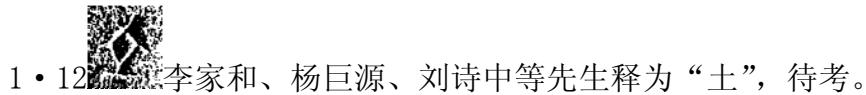
③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四期，第76页。

④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第73页。

⑤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江西刻划文字符号与甲骨卜辞文字》，中原文物，1989年第四期，第76页。



1・11 释为“戈”。



1・12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土”，待考。



1・13 不识。



1・14 释为“目”。



1・15 释为“虫（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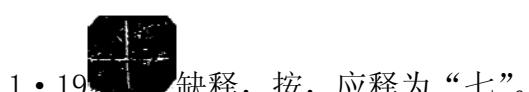
1・16 释为“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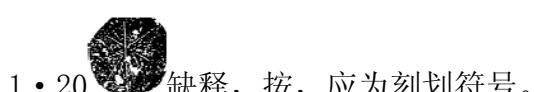
1・17 释为“巳”。



1・18 王恩田先生释为“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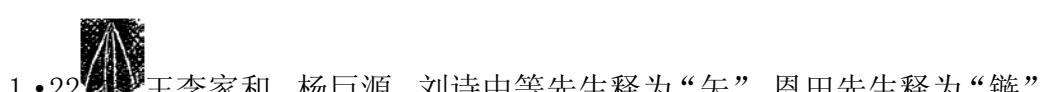
1・19 缺释，按，应释为“七”。



1・20 缺释，按，应为刻划符号。



1・21 释为“网”。



1・22 李家和、杨巨源、刘诗中等先生释为“矢”，恩田先生释为“镞”。



1・23 不识。



1・24 与 3・25 二字都释为“氏”。



1・26 释为“十”。

1・27  释为“三十”。

1・28  释为“日”。

1・29  缺释，按，疑为“十”。

1・30  不识。

1・31  王恩田先生释为“镞”。

1・32  不识。

1・33  释为“大”。

1・34  、1・35  两陶文不识。

1・36  释为“匕”。

1・37  不识。

1・38  释为“七”。

1・39  释为“戈”。

1・40  不识。

1・41  释为“乙”。

1・42  释为“午”。



以上六陶片疑为刻画符号，不识。



1·49 释为“戈”。



1·50 不识。



1·51 王恩田先生释为“口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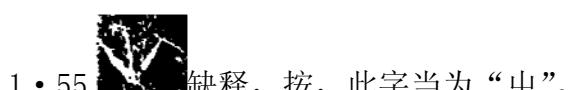
1·52 释为“镞”。



1·53 残勒无字。



1·54 释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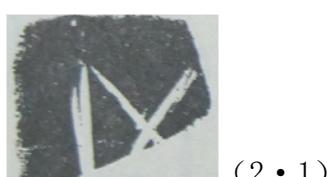


1·55 缺释，按，此字当为“中”。



1·56 释为“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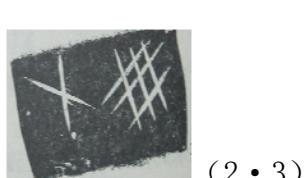
2. 郑州南关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①。



(2·1)



(2·2)



(2·3)



(2·4)

^①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2·5)



(2·6)



(2·7)



(2·8)

陶文考释：



2·1 刻画符号，或当释为“十五”。



2·2 释为“三”。



2·3 释为“五口”。



2·4 疑为“中”。



2·5 释为“七”。



2·6 符号，不识



2·7 释为“木”。



2·8 疑为“目”。

3. 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商代陶文字符。见《陶文图录》、《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①。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79 年第 6 期。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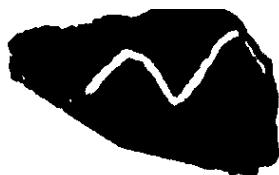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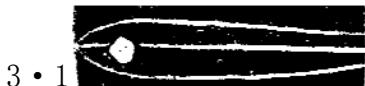


(3・21)



(3・22)

陶文考释：



3・1 按，疑为“刀”。



3・2 释为“刀”。



3・3 此字残勒不识。



3・4 释为“止”。



3・5 释为“止”。



3・6 王恩田先生释为“目”，季云先生释为“臣”，他说：“此字也可以释‘目’，但考虑陶器唇上的文字多为横书，释‘臣’似更合宜”。^①按，此字应释为“目”。



3・7 释为“目”。



3・8 王恩田先生缺释，按，疑为“大”。

3・9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释为“六”，^②王恩田先生缺释。

按，此字释为“六”较合理。



3・10 不识。

^① 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第8期，第51页。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第37页。



3·11 释为“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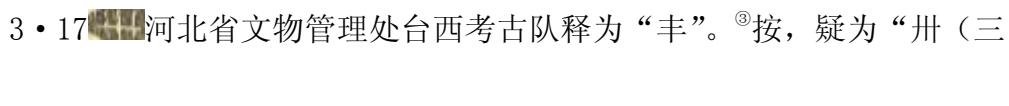
3·12 释为“大”。

3·1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释为“肉”。^①按，疑为“目”。3·1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释为“卜”，^②王恩田先生释为“𠂔”。按，释为“卜”较合理。

3·15 按，疑为“乙”。



3·16 释为“二”。

3·1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释为“丰”。^③按，疑为“卅（三十）”。

3·18 释为“七”。



3·19 释为“三”。



3·20 按，释为“中”。



3·21 释为“鱼”。

3·22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释为“戈”，^④王恩田先生释为“戈”按，应释为“戈”。

4. 磁县下七垣出土商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磁县下七垣发掘报告》^⑤。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第3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第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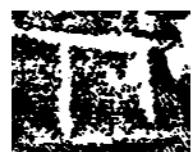
^⑤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4·1)



(4·2)



(4·3)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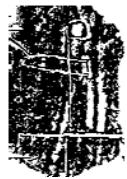
(4·5)



(4·6)



(4·7)



(4·8)



(4·9)



(4·10)



(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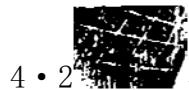


(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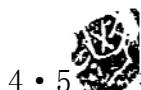
陶文考释：



4·1 释为“文”。



4·2、4·3、4·4三张陶片待考。



4·5 按，应为“子”。



4·6 王恩田先生释为“三十”，按，当释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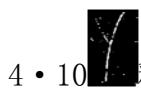
4·7 待考。



4·8 释为“戈”。



4·9 文字残缺，不识。



4·10 释为“卜”。



4·11 按，释为“七”。



4·12 待考。

5. 上海马桥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①。



(5·1)



(5·2)



(5·3)



(5·4)

①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1 期。



(5·5)



(5·6)

陶文考释：

5·1 释为“五”。

5·2 待考。

5·3 不识，待考。

5·4 疑为“五五”。

5·5 释为“七”。

5·6 释为“戊田”。

6. 殷墟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古陶文汇编》^①、《殷墟发掘报告》^②、《殷墟的发现与研究》^③。



(6·1)



(6·2)



(6·3)



(6·4)

① 高明，《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3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发掘报告 1958—1961》，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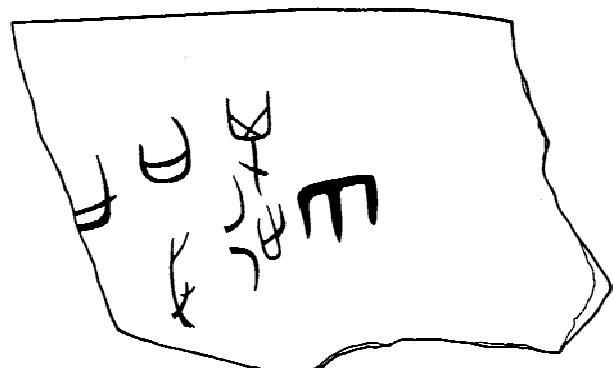
(6・7)



(6・8)



(6・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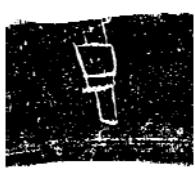
(6・31)



(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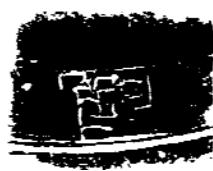
(6・33)



(6・34)



(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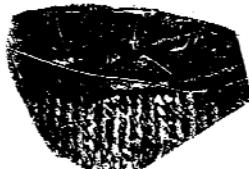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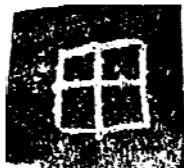
(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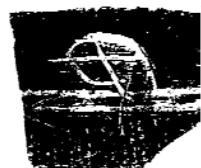
(6·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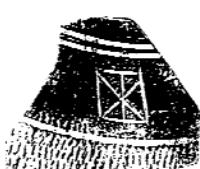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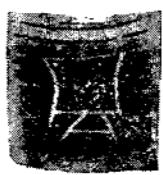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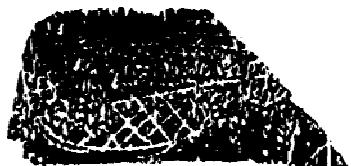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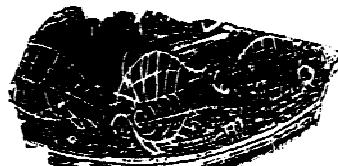
(6・61)



(6・62)



(6・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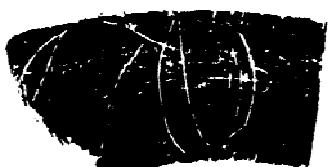
(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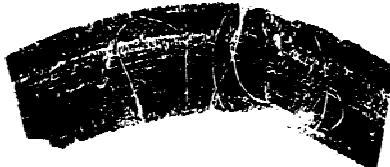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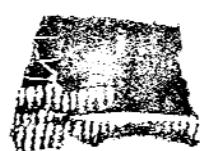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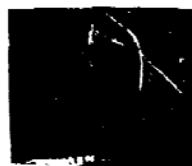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6・100)



(6·101)



(6·102)

陶文考释：



6·1 释为“六”。



6·2 按，释为“五”。



6·3 释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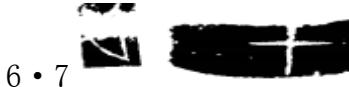
6·4 释为“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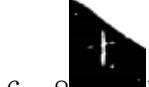
6·5 释为“十”。



6·6 释为“七”。



6·7 释为“七”。



6·8 释为“十”。



6·9 释为“卅（三十）”。



6·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墟的发现与研

究》：“辞例近卜辞，共六字，左边残存一‘曰’字，其右共五字，分三行书写，释为‘曰𠂔（禽）征（延）雨’。‘𠂔’当为地名，‘延雨’为卜辞习见，即延续下雨之意”。按，‘𠂔’当释为“必”。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6·11 释为“祝”，按应释为“祀”。



6·12 释为“𦥑乙”。



6·13 按，疑释为“立文六”



6·14 释为“口守”。



6·15 释为“曰重中口友？重”



6·16 释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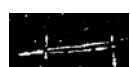
6·17 释为“干”。



6·18 释为“立”。



6·19 疑释为“子”。



6·20 释为“井”。



6·21 释为“井”。



6·22 释为“亚”。



6·23 释为“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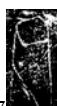
6·24 待考。



6·25 释为“口𦫧”。



6·26 按，释为“日”。



6·27 待考



6·28 释为“戊”。



6·29 释为“戊”。



6·30 释为“戈”。



6·31 释为“甗”。



6·32 释为“鬲”。



6·33 释为“享”。



6·34 疑为“良”。



6·35 、6·36 、6·37 、6·38 、6·39 、



6·40 、6·41 以上七陶片字迹不清，不识。



6·42 疑为“止”。



6·43 释为“木”。



6·44 释为“木”。



6·45 释为“木”。



6·46 释为“木”。



6·47 释为“田”。



6·48 释为“田”。



6·49 待考。



6·50 释为“田”。



6·51 释为“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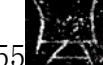
6·52 释为“午”。



6·53 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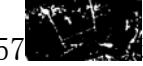
6·54 释为“皿”。



6·55 释为“皿”。



6·56 释为“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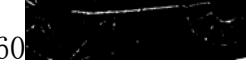
6·57 释为“皿”。



6·58 疑为“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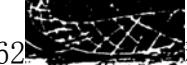
6·59 待考。



6·60 释为“車”。



6·61 待考。



6·62 释为“它”。



6·63 释为“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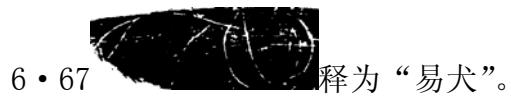
6·64 释为“魚魚魚”。



6·65 释为“犬它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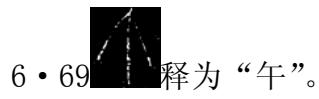
6·66 释为“犬”。



6·67 释为“易犬”。



6·68 释为“易犬”。



6·69 释为“午”。



6·70 释为“午”。



6·71 释为“又(右)”。



6·72 释为“又(右)”。



6·73 释为“又(右)”。



6·74 释为“又(右)”。



6·75 释为“左”。



6·76 释为“中”。



6·77 释为“中”。



6·78 释为“已”。

6·79  释为“万丘口”。

6·80  或为“才”，待考。

6·81  释为“工”。

6·82  待考。

6·83  王恩田先生释为“布”，待考。

6·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将此字释为“莫”。^①按，待考。

6·85  释为“五”。

6·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将此字释为“祀”。^②按，待考。

6·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将后二字释为“舟疑亞”，^③甚是。

6·88  释为“日乙”。

6·89  王恩田先生释为“口七八六六十二”。

6·90  不识，待考。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第10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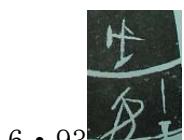
③ 同上。



6·91 释为“籍”。



6·92 释为“饗”。



6·93 王恩田先生释为“戊女”，刘一曼先生释为“戊母十”。

按，此陶片上应有四个字：1.  可比照甲骨文、金文，（林一·一·七）、（铁九一·一）、（父戊簋）、（肆簋），当释为“戊”；2. 可比照金文中女，（女宀方彝）、（令鼎），此字当释为“女”；3. 释为“十”；4. 此字不清，或为“丁”，待考。



6·94 释为“又（右）”。



6·95 释为“子”。



6·96 疑为“子”。



6·97



6·98



6·99

以上三陶片不识，待考。



6·100

释为“目”。



6·101

释为“𠂇”。



6·102

待考。

7. 2000--2001 孝民屯东南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2006 年第 3 期，第 351--384 页。



(7·1)



(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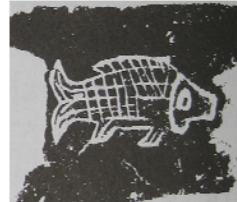
(7·3)



(7·4)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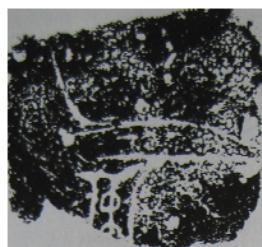
(7·6)



(7·7)



(7·7)



(7·8)



(7·9)

陶文考释：



7·1 释为“五八七”。



7·2 释为“八六一六六”。



7·3 刻有两组筮数易卦，左为“口口七六七六”，右为“口口六六六七”。



7·4 可有两组筮数易卦，左为“一一六六一六”，右为“六一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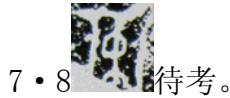
7·5 释为“鍼”。



7·6 释为“魚”。



7·7 释为“畱公万(丙)敦辟，作父辛尊彝□”。后一字不清，字不识。



7·8 待考。



7·9 释为“丁酉”。

8. 2003--2004 安阳孝民屯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 2003---2004 年代发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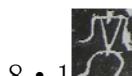


(8·1)



(8·2)

陶文考释：



8·1 释为“大”。

^①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 2003--2004 年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1 期，第 14--25 页。



8·2 释为“一五一—六六”。

9. 湖北秭归县柳林湾出土商代陶文字符及考释。见《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 1998 年发掘简报》^①。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10)



(9·11)



(9·12)

陶文考释：

以上陶文字符共 12 片，有几片可以看作字符。9·5 可释为“口”，
 9·8 应释为“中”，9·10 疑为“舟”，9·11 应释为“五”，9·12 应释为“木”，其他应为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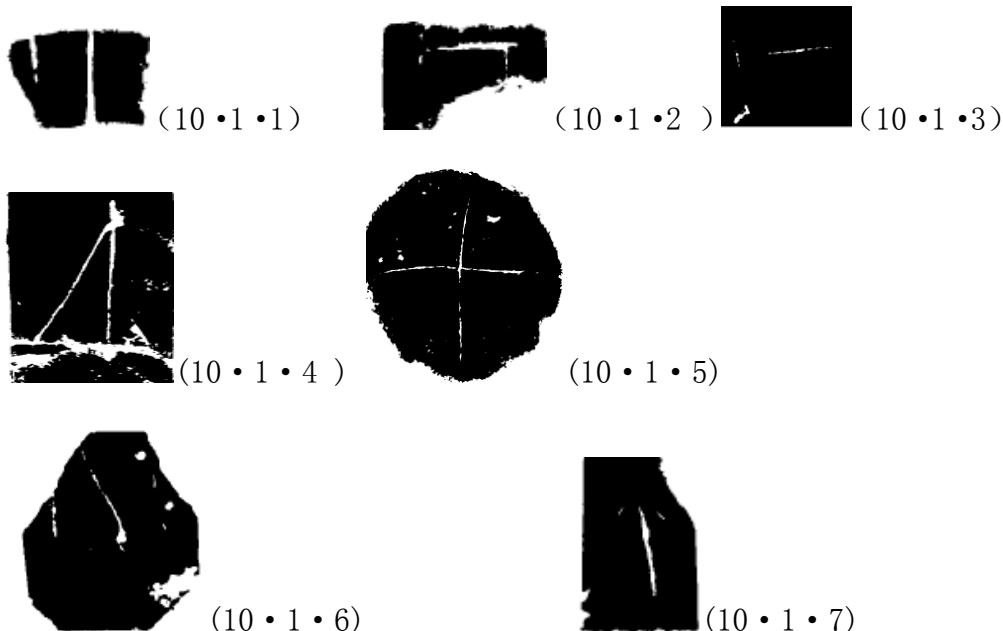
10. 郑州小双桥朱书陶文字符，见《1995 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②、《郑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 1998 年发掘简报》，考古 2000 年第 8 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 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 年第 3 期。

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①、《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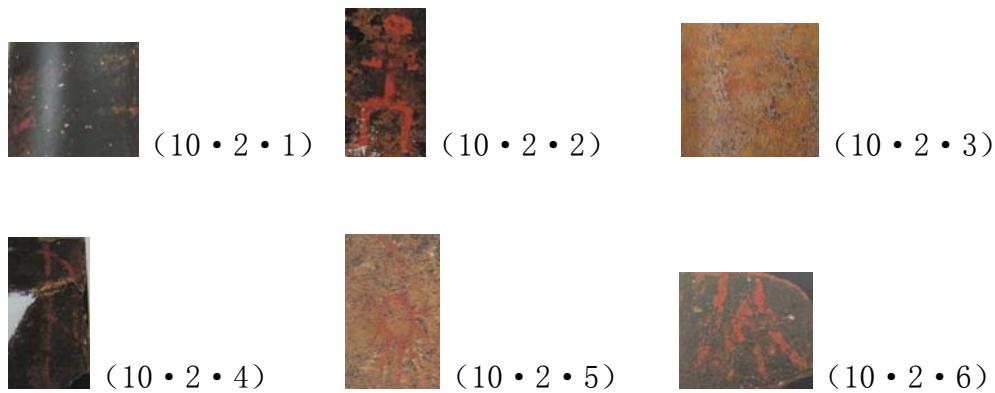
(1) 小双桥陶文字符



陶文考释：

以上小双桥陶文符号共 7 片 7 字符，由于符号不甚清晰，都无法识别。小双桥“陶文符号刻画比较简率，当出自制器陶工之手，多为数字或记号”。^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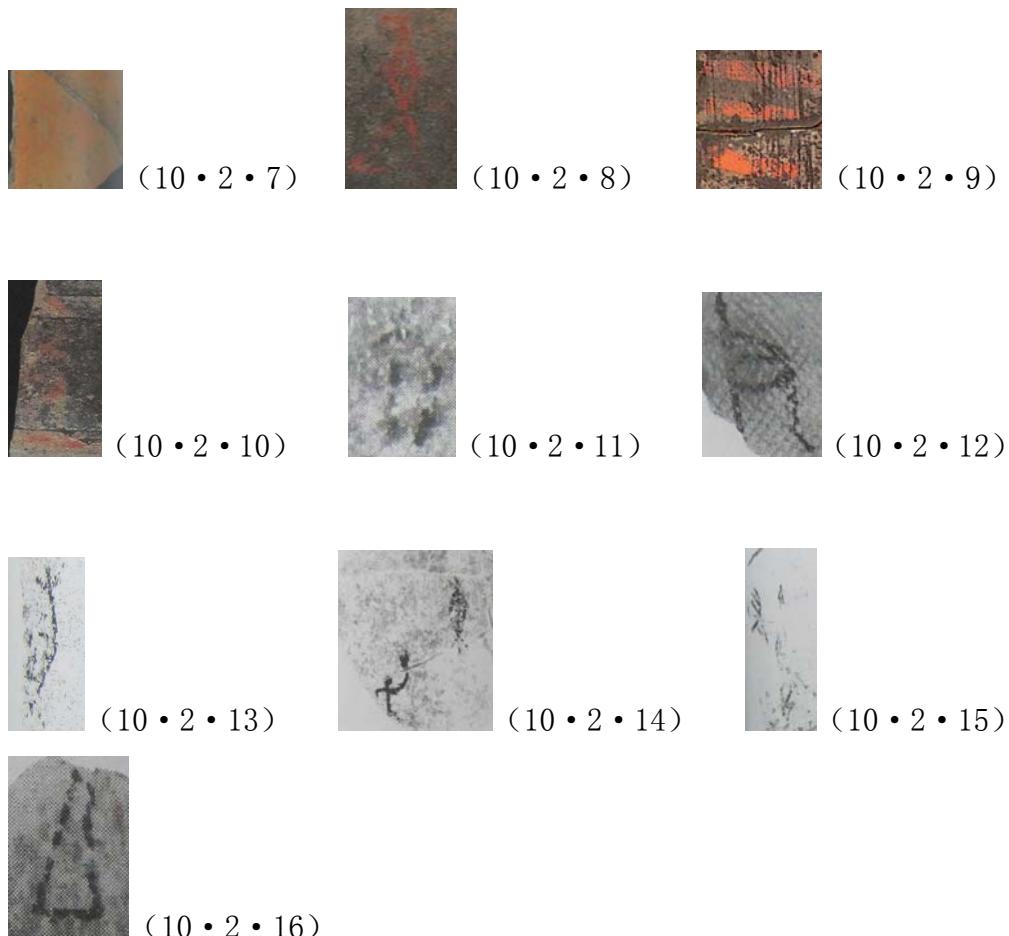
(2) 小双桥朱书陶文



^① 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35—44页。

^② 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35—38页。

^③ 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第10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朱书陶文考释：

10·2·1 释为“二”。

10·2·2 释为“天”。这是一个正面人形，突出人的头部。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五张陶片都无法释读，待考。

10·2·8 字迹不甚清晰，疑为“交”字，可以对照金文《交鼎》(交)。

①

①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701页。



10·2·9 释为“三”。



10·2·10 有3个字，可惜字迹不清，无法释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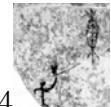
10·2·11 字迹不清，无法释读。



10·2·12 此陶文释为“尹”。



10·2·13 宋国定先生释为“旬”，^①曹建敦先生释为“东”。^②按，字迹不甚清晰，待考。



10·2·14 此拓片有两字，右上方 释为“东”，左下方 释为“天”，宋国定先生释为“夭”，曹建敦先生释为“吴”。^③按，应该释为“夭”。



10·2·15 宋国定先生认为两行共三个字，从右向左，第一字 释为“匕”，



甚是。第二字 字迹不清，无法辨识；第三字 释为“帚”，^④待考。黄德宽先生说：“陶片上至少是两行3个字”。按，此陶片至右向左应该是两行4个字，第1字为“匕”、第2、3字不清、第4字 待考。



10·2·16 待考。



11. (11·1) 释为“鼓”。

^① 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42页。

^② 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36页。

^③ 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36页。

^④ 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42页。

二、本章小结

本章收集了当前殷商陶文资料，将所收陶文进行考释。通过研究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殷商陶文的概况。

殷商陶文大多数是在陶器制成以后，入窑烧制之前，刻在陶坯上的，这类陶

文笔划较深而宽，比如，拓片 1·1 、1·2 、3·6 等；一部分是陶器烧成以后刻的，这类陶文，笔划较浅而窄，若细心观察，发现字口多有毛

茬，比如，拓片 1·10 、1·12 、6·51 、6·89 等；还有少数陶文，是陶器烧好后，用毛笔写上的，比如，小双桥朱书陶文即是用毛笔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

从内容上看殷商陶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族名、人名。比如，6·64 （鱼），卜辞中鱼有作人名的。如《屯南》1054 “乙亥贞：鱼亡祸”。金文中也常见鱼作族名。如《三代》2·3 鱼鼎，《三代》14·16 鱼觚、《三代》15·5 鱼爵、《三代》11·18 鱼作父庚尊等；

再如，6·66 （犬），“卜辞中犬字有作侯名、族名或地名之用例”。^①如《京》4777 “口辰贞：令犬侯……吉王事”。《粹》883 “信酉贞：犬受年，十月”。金文中也有《三代》2·21 犬父丙鼎，犬作族名。这类陶文最为常见，有戌、戈、木、井、犬易、车、亚、龟、虫、龙、田、皿、亥等等，可参考《殷墟陶文研究》^②。

2. 数字。比如，1·26 （十）、1·27 （三十）、3·16 （二）、3·18 

（七）等等。“这些数字，是陶工在器坯上刻的。它表示记数还是器物在一套中的顺序，或者其他含义，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③。

^① 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51页。

^② 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51页。

^③ 同上。



3. 卦辞。比如，7·1 (五八七)、7·2 (八六一六六)、8·2 (一五一—六六) 等等。

4. 位置符号。在有的陶器上有“左”、“中”、“右”字，每器一字。可能是祭祀用的器物，“左、中、右是表示该器物应在的位置”^①。



5. 其他。主要是不能释读的文字符号，大多为记号，如，9·1 、9·2 、10·1·1 等。还有一些虽能释读但无法归类的，如，6·13 (立文六)、6·16 (来) 等。

“在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商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多士》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传世文献对商之先人已有典册记载；殷墟甲骨的发现，再现了商代晚期文字使用的真实情况”^②；而商代考古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址的发现，主要有殷墟、郑州二里岗、郑州南关、江西清江吴城、河北藁城台西村、磁县下七垣、郑州小双桥等地获得文字资料，这为商代前期文字的探索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

从我们对商代陶文的收集和研究情况来看，这些陶文为具体探索当时的文字发展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殷商陶文的考释与研究，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些特点。

其一，从地域分布上看，分布较广。从早期的都城所在地郑州二里岗遗址，到晚期都城安阳遗址都有陶文资料的发现，在商代都城之外的很多地方也有发现，河北藁城、上海马桥、湖北秭归以及远在江南的江西清江吴城、江西新干等地。

其二，从时间上看，具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从收集到的殷商陶文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商代前期的二里岗期甚至更前的偃师商城时期，一直到殷墟小屯都有发现陶文资料。这为我们提供了殷商陶文在纵向上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这个顺序不仅与文献对商代的历史发展的记载相符，而且在考古学上得到了证实。

其三，从陶文字形来看，所收集的殷商陶文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黄德宽先

^①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上辑，《符号与文字》，1958年。

^② 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生说：“从商代前期早段到中期和晚期，时间跨度有二三百年之久（相当于前 17 世纪—前 14 世纪），但无论是郑州二里岗期的陶文、小双桥朱书，还是吴城和台西陶文，其刻写风格、特点和文字符号的简练成熟程度，相似性明显大于差异性，尤其是几批陶文都出现的一些字，如字数字和‘臣、刀’等象形字，几乎没有什 么差异性。这表明陶文反映出的文字系统发展是缓慢的、渐进式的，各批陶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性”^①。

其四，从陶文书写看，文字连写的资料时有发现。江西清江吴城陶文有连写，

如，1·1  、1·4  等，这些可能记载了与祭祀相关

的内容；小双桥也有三个字以上的连写陶文，如，10·2·10  、10·1·15 

等；殷墟也出现一些陶文连写的，如，6·11  、6·15  等；二里岗期陶文虽然没有可靠的连写物证，但同时期的甲骨刻辞文字的发现则可以作为旁证。

殷商陶文资料尽管数量有限并且是零散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我们将殷商陶文与同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比照以及与之后的文字材料比照，对我们探索商代前期文字，尤其是以陶文为主的资料，将有重要的启迪。黄德宽先生说：“从小屯陶文与成熟的甲骨文系统的关联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已发现的商代前期各批陶文对探讨当时文字系统的发展都具有标本价值，由这些标本我们可以推断商代前期应该有一个广泛流行的文字系统，并且殷墟甲骨文应该是这个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在商代前期的发展水平已与甲骨文系统相差不远”^②。在谈到对殷墟陶文研究的意义问题时，刘一曼先生说：“殷墟陶文的族名较多，特别是其中有一些族名时代较早，又有一些族名（或人名）在甲骨文、金文中未见或罕见，这对于研究殷代的族氏有重要意义”^③。

总之，对殷商陶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讨。

^① 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3 页。

^②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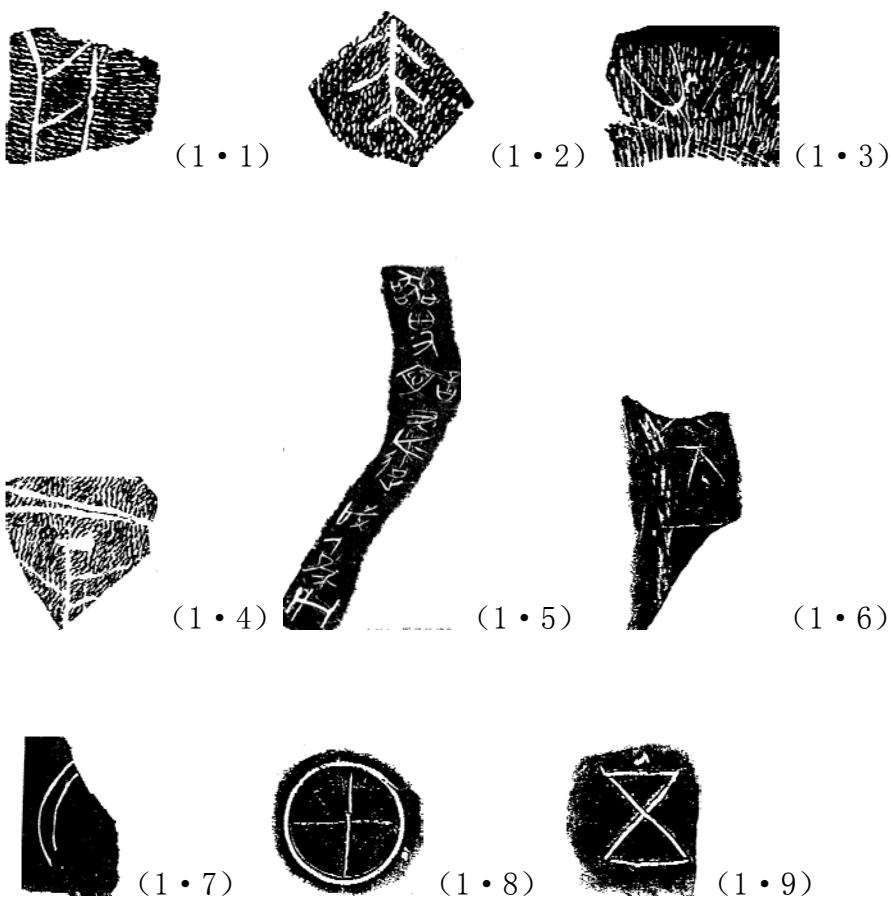
^③ 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361 页。

第三章 西周陶文研究

本文将按照出土西周文化遗址所属的年代先后，同时参考各发掘报告对西周文化遗址的时代说明，以及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①一书中对西周文化遗址的分期顺序来编排西周陶文资料。

一、出土西周陶文拓片及考释

1. 陕西周原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周原与周文化》^②、《陶文图录》、《古陶文汇编》^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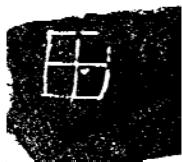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② 同上。

③ 高明，《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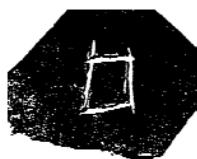
(1 • 10)



(1 •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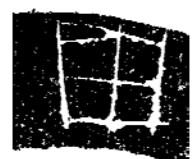
(1 • 12)



(1 • 13)



(1 • 14)



(1 • 15)



(1 • 16)



(1 • 17)



(1 • 18)



(1 • 19)



(1 • 20)



(1 • 21)



(1 • 22)



(1 • 23)



(1 • 24)



(1 • 25)



(1 • 26)



(1 • 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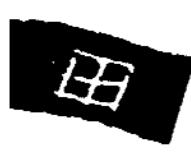
(1•43)



(1•44)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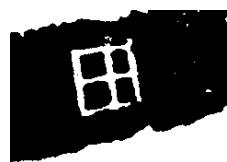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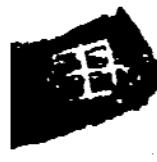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陶文考释：



1·1 徐锡台先生释为“夫”^①。



1·2 待考。



1·3 待考



1·4 待考。



1·5 陈全方先生认为此拓片有陶文共七字，左往右行，作：

“**器、叟、訖、書、成、為、王**”，释为“**器、叟、訖、書、成、為、王**”除

① 徐锡台，《西周陶文试释》，人文杂志，1985年6月，第3期，第91页。

王字正书外，其余六字均为横数。^①第一字器释为“器”。第二字卑，徐锡台先生认为应是从匚从又，隶定为“卑”，释为“卑”字，当读为“俾”。^②第三字𠂔，应是从言从文，隶定为“𠂔”字，《者沴钟》铭文有此字。郭沫若读为“𠂔”字，谓“𠂔字见《玉篇》：‘谋也’”。^③徐锡台先生认为陶文“𠂔”，应为古“誉”字，有称美之义。^④第四字書，徐锡台先生认为：“从辵从聿从者，……应隶定为‘遽’字，故此字为‘書’字的异构。”^⑤第五字成释为“成”。第六字为，陈全方释为“为”，徐锡台先生将此字释为“象”，他说：“……但从结构分析，此字非‘为’字。《舀鼎》铭有为字，其上部从瓜，与此字不类，而陶文字形聿与西周《师汤父鼎》铭中‘象’字相同，当为象字无疑”。^⑥第七字灾陈全方先生释为“王”，徐锡台先生说：“此字与殷墟卜辞中‘灾’（《菁》911）；‘灾’（《前》2·15·2）字形近似，当为灾字，‘灾’本从川，才声，故字在此当读为‘才’”。^⑦王恩田先生将此拓片释为“周又𠂔建造成爲王器”。



1·6 释为“八一六一”。

1·7 陈全方先生将其释为“六”。^⑧按，待考。

1·8 释为“七”。



1·9 释为“五”。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0、171页。^② 徐锡台，《西周陶文试释》，人文杂志，1985年6月，第3期，第92页。^③ 郭沫若，《文史论集》，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325页。^④ 徐锡台，《西周陶文试释》，人文杂志，1985年6月，第92页。^⑤ 同上。^⑥ 同上。^⑦ 同上。^⑧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2页。



1・10 待考。



1・11 释为“周”。



1・12 释为“周”。



1・13 马叙伦先生释为垣字初文，(《金文诂林》卷七，4778)。按，
释为“口”。



1・14 释为“周”。



1・15 释为“周”。



1・16 陈全方先生：“沿唇素面，上横刻‘𠁧’，(疑是“一甫”的合
文)”。王恩田先生疑为“周六七”。按，王恩田先生释法正确。



1・17 待考，按，释为“日”。



1・18 释为“八”。



1・19 、1・20 两陶片应释为“日”。



1・21 、1・22 两陶片应释为“巳”。



1・23 陈全方先生认为当释为“宫”，^①马叙伦先生说：“宫为口之后起字，口为口之异文，吕字说文未录，而见于鬯之古文作鬯者”。（《金文诂林》卷七，4778）



1・24 不识，待考。



1・25、1・26、1・27 以上三张陶片陈全方先生说“疑是‘二丁’或‘丁二’合文”。^②按，当释“丁二”。



1・28 与1・29 待考。



1・30 释为“丁”。



1・31 王恩田先生释为“入”，陈全方先生释为“六”。



1・32 王恩田先生释为“三十”，按，当释为“卅（三十）”。



1・33 按，陈全方认为此字是“巫”，释为“巫”。



1・34 王恩田先生释为“七”，陈全方先生释为“三四”。



1・35 王恩田先生释为“六”，陈全方释为“三三”。



1・36 释为“五”。



1・37 释为“四”。



1・38 释为“三”。

① 陈全方，《周原出土陶文研究》，文物，1985年第3期，第65页。

② 同上。



1·39 按，应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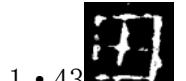
1·40 释为“周”。



1·41 释为“周”。



1·42 按，应为“五”。



1·43



1·44



1·45



1·46



1·47

以上五陶文应释为“周”。金文“周”字，**𠂔**（德方鼎）、**𠂔**（**𠂔**鼎）、**𠂔**（无**𠂔**鼎）、**𠂔**（井侯簋）、**𠂔**（休盘）等，可以看出金文与陶文中的“周”具有一贯性。



1·48 陈全方将此字释为“雨”。按，甲骨文字中雨字字形有

𠂔（铁·32·3），**𠂔**（佚·55），**𠂔**（后·1·20·1）等字形，与此字形差异较大，故将**𠂔**释为“雨”不妥，待考。



1·49 释为“周”。



1·50 释为“周”。



1·51 释为“五”。



1·52



1·53



1·54

这三张陶片陈全方先生将其释为“六”。按，应释为“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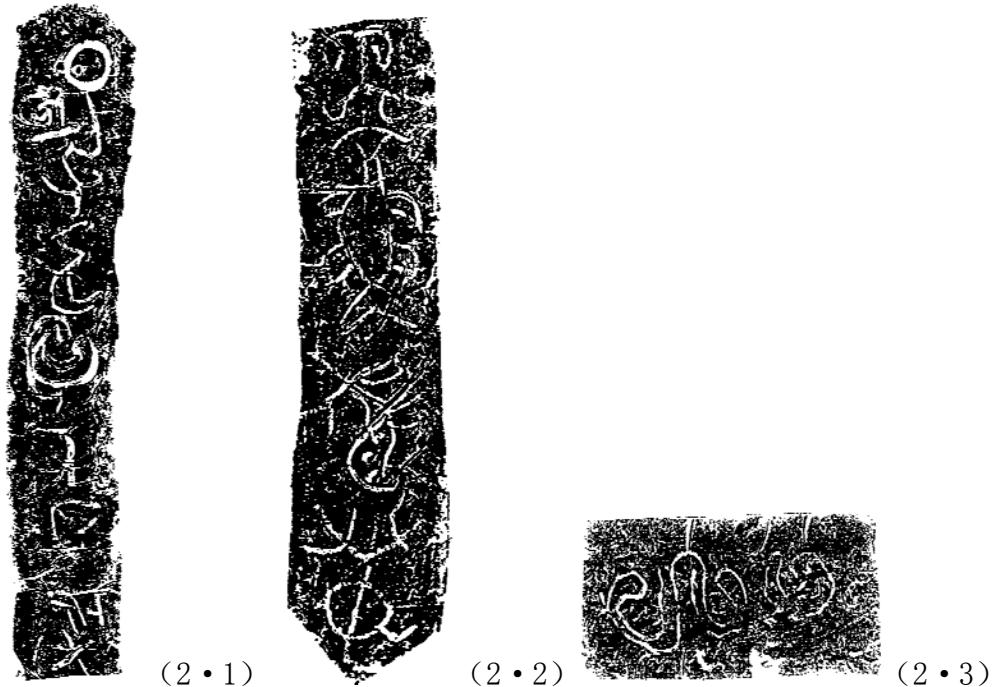


1·55 与1·56 陶文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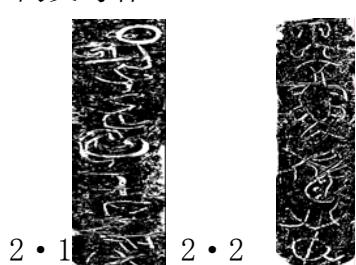
1·57 陈全方先生认为横刻“**介**”为“**六**”字，王恩田先生释为“六”。

按，此字应释为“六”。

2. 山东莱阳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盃》^①,《陶文图录》、《古陶文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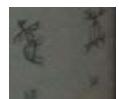


陶文考释:



李步青、吴云进二位先生在《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盃》一文中将拓片摹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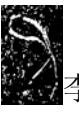
 十四字，并将每个字做了释文。他们认为所摹字形中，第一字释为“己”、

^① 李步青, 吴云进, 《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盃》, 文物, 1987年第10期, 第80—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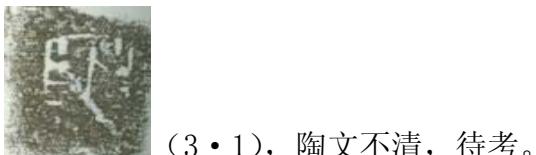
第二字为“国”、第三字为“父”、第四字为“乙”、第五字为“作”、第六字为“酉”、第七字为“午”、第八字为“未”、第九字为“宅”、第十、十一字不识、第十二字为“”、第十三字为“鹿”、第十四字为“龟”。^①王恩田先生将此陶文拓片释为“**𠂔**（祀）父乙□□盃□□魚鹿龜”。

2·3  李步青、吴云进先生将其摹写为“、

2·4  李步青、吴云进先生将其摹写为

2·5  李步青、吴云进将其摹写为

3. 山东省平阴县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山东省平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②。



(3·1)，陶文不清，待考。

4. 山西洪洞永凝堡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山西洪同永凝堡西周墓葬》^③。



(4·1)，待考。

5. 陕西武功岸底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陕西武功底岸西周先周遗址发掘

^① 李步青、吴云进，《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盃》，文物，1987年第10期，第80--81页。

^②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山东平阳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文物，2001年第5期，第9—16页。

^③ 陕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洪洞县文化馆，《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第2期，第1—13页。

简报》^①。



(5·1), 待考。

6. 陕西凤翔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10)



(6·11)



(6·12)

陶文考释：

6·1 待考。

6·2 释为“𠂇”。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第1—28页。



6·3 疑为“五五”。



6·4 释为“卜”。



6·5 释为“井”。



6·6 疑为“曰”。



6·7 释为“又（右）”。



6·8 、6·9 、6·10 、6·11 以上四陶片不识，待考。



6·12 释为“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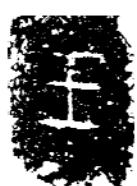
7. 湖北宣城出土西周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



(7·1)



(7·2)



(7·3)



(7·4)



(7·5)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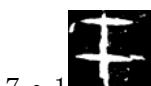


(7·7)



(7·8)

陶文考释：



7·1 释为“王”。



7·2 释为“王”。



7·3 释为“王”。



7·4 王恩田先生释为“宝”，按，待考。



7·5 王恩田先生释为“二十”，按，当释为“廿（二十）”。



7·6 王恩田先生释为“二十”，按，当释为“廿（二十）”。



7·7 释为“四十”。



7·8 释为“午”。

8. 河南新郑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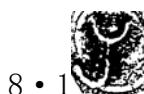


(8·17)



(8·18)

陶文考释：



8·1



8·2



8·3



8·4

以上四陶片不识，待考。



8·5

王恩田先生释为“三十”，按，当释为“卅（三十）”。



8·6

释为“五”。



8·7

释为“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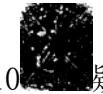
8·8

释为“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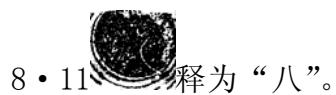
8·9

释为“井”。



8·10

疑为“五”。



8·11 释为“八”。



8·12 释为“忘”。



8·13 疑为“入”。



8·14 释为“氏”。



8·15 释为“三”。



8·16 释为“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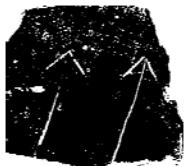


8·17 释为“千”。



8·18 释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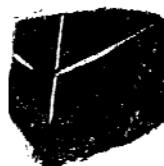
9. 河南登封阳城出土陶文字符及考释。见《陶文图录》。



(9·1)



(9·2)



(9·3)



(9·4)



(9·5)



(9·6)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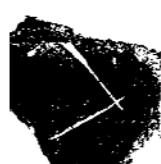
(9·8)



(9·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陶文考释：



9・1 释为“竹”。



9・2 王恩田先生释为“三十”，按，当释为“中”。



9・3 王恩田先生释为“草”，按，当释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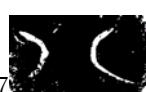
9・4 释为“氏”。



9・5 释为“氏”。



9・6 释为“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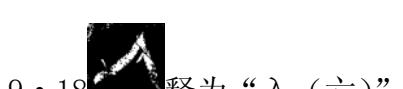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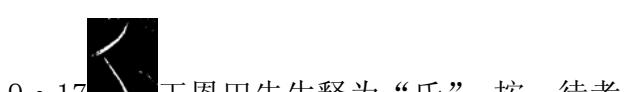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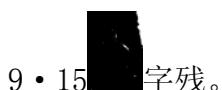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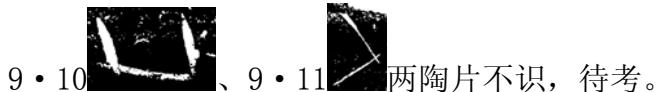
9・7 释为“八”。



9・8 释为“刀”。



9・9 释为“匕”。



二、本章小结

西周陶文资料有限，主要是陕西周原、凤翔、河北宣城、河南新郑、河南登封阳城等地出土的陶文。从陶文的刻写方式上看，西周陶文有烧制之前，刻于陶坯上的，也有烧成后刻的；从内容上看西周陶文主要有：1. 族名、人名；2. 数字；3. 卦辞；4. 位置符号；5. 其他。

我们可以看出西周陶文与殷商陶文不论是在字体上还是内容上都彼此关系密切。如，刻划的“一”、“三”、“五”等数字和用数字组成的易卦符号，多刻于盆、罐、盂等器物的唇上或近口处，与郑州二里岗陶文位置相似。又如，除数字符号外，在瓦片上刻有“左”、“右”、“上”、“仲”等字，当与其陈放位置有关。这种情况，“又与殷墟出土的陶文和侯家庄岗 1001 大墓出土的三间分别刻有‘右’、‘中’、‘左’三个铭文青铜方盂是相似的”。^①再如，殷商与西周陶文中的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数字  (二)、 (三)、 (五)、 (七)、 (八)、 (二十)、

 (三十) 等文字的写法甲骨文、金文都是相似的。通过对这些陶文字符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属于文字，和商周甲骨文、金文属于一个系统的文字。可以说甲骨文和金文从陶文中汲取了大量的精华，这既有数字符号，也有象形文字等等。陈全方先生：“可以说，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金文是历代陶器刻符的发展”^①。所以，陶文的研究对我们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有重要的价值。

考古文化遗址中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零散的，有一些陶文一直还没能得到释读，有的释读还有争议，我们会沿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继续前行，为西周陶文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结语

通过对殷商和西周陶文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殷商与西周陶文是文字，尽管学者们对此有争议；本文收集了当前一些新材料，补充了殷商与西周陶文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也对一些误释或未释的陶文给出释读；对殷商与西周陶文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希望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有些陶文笔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但知识水平有限，有些不能给出准确的释读，这还有待进一步考释；由于陶文资料分散，难以收集，难免有一些资料没有收集到，同时由于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和发现，当前也会有部分新材料没有能收集齐全。不足之处，还请谅解。

参考文献

按参考书目的出版年月顺序排列，同年的将按照作者姓氏的拼音字母排序。

一、著作类

- [1]河南省文物工作队. 郑州二里岗[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2]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顾廷龙. 古陶文看录[M]. 台湾：国立北平研究院石印本，1936.
- [4]陕西省博物馆. 秦汉瓦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 [5]金祥恒. 陶文编[M]. 台湾：艺文印书馆，1964.
- [6]吴重蕙考藏，翁大年编释. 续封泥考略（四卷）[M]. 台湾：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 [7]陈直. 摩庐藏陶据存[M]. 山东：齐鲁书社，1983年3.
- [8]西安市文管会. 秦汉瓦当[M].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 [9]陕西省考古所秦汉室. 新编秦汉瓦当图录[M]. 陕西：三秦出版社，1986.
- [10]刘士莪. 西北大学藏瓦选集[M]. 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 [11]袁仲一. 秦代陶文[M]. 陕西：三秦出版社，1987.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发掘报考（一九八五一—一九六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13]钱君匋等. 瓦当汇编[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 [14]徐锡台等. 周秦汉瓦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5]高明. 古陶文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陈宝琛. 激秋馆藏古封泥[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1.
- [17]高明，葛英会. 古陶文字征[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8]吴式芬，陈介祺. 封泥考略[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1.
- [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20]陈直. 关中秦汉陶录[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 [21]刘秋兰. 秦代陶文研究[M]. 台湾：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4.
- [22]孙慰祖. 古封泥集成[M]. 山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 [24]殷荪.中国砖铭文字徵[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
- [25]刘鹗.铁云藏陶·铁云封泥[M].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8.
- [26]周进集藏，周绍良整理、李零分类考释.新编全本季木藏陶[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7]梁章凯编.齐国陶文五十品[M].上海：西泠印社，1999.
- [28]殷荪.中国砖铭[M].江苏：江苏汲古阁出版社，1999.
- [29]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31]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2]孙慰祖.封泥的发现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33]周宝宏.古陶文形体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4]彭明瀚.吴城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35]王恩田.陶文图录[M].山东：齐鲁书社，2006.
- [36]徐在国.战国文字论著录索引[M].北京：线装书局，2007.

二、论文类

- [1]唐兰.陈常甸金考[J].国学季刊，1935，5(1):1—5.
- [2]吴大澂.吴大澂手书古陶文考释一、二[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1935，9(4).
- [3]闻宥.古陶文彙录序[J].励学，1936，1(6):1-2.
- [4]王襄.古陶残器絮语[J].燕京学报，1948 (35): 213—226.
- [5]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J].考古通讯，1955，(3): 69.
- [6]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J].考古通讯，1955，(1): 9—21.
- [7]郭宝钧，得志，张云鹏，周永珍.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6，(2): 1—31.
- [8]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岗社附近古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5，(10): 3—24.
- [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碧沙岗发掘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6，(3): 27—40.

- [1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 (4): 3—8.
- [11]金学山. 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J]. 考古学报, 1957, (3): 63—92.
- [12]谢锡益. 燕下都一直琐记[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 (9): 61—64.
- [13]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 侯马东周时代烧陶窑址发掘记要[J]. 文物, 1959, (6): 45—46.
- [1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J]. 文物, 1966, (1): 10—18.
- [15]李先登. 天津师院图书馆藏陶文选释[J]. 天津师院学报, 1978, (2): 92—94.
- [16]李元章. 山东栖霞县大北庄发现东周墓[J]. 文物, 1979, (5): 90—91.
- [17]孙作云. 关于夏初史[J]. 河南文博通讯, 1979, (1): 2—5.
- [18]朱德熙. 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J]. 古文字研究, 1979, (1): 116—120.
- [19]邯郸市文物保管所. 河北邯郸市区考古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 1980, (2): 142—146, 158.
- [20]李恭笃. 封泥浅谈[J]. 辽宁文物, 1980, (1): 23—30.
- [21]牛济普. 郑州、荥阳两地新出土战国陶文介绍[J]. 中原文物, 1981, (1): 13—15.
- [22]吴镇烽, 尚志儒. 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1, (1): 12—38.
- [23]张光裕. 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的问题[J].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81, (12): 91.
- [24]李学勤. 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J]. 齐鲁学刊, 1982, (5): 35—37.
- [25]李先登. 河南登封阳城遗址出土陶文简释[J]. 古文字研究, 1982, (7): 207—231.
- [26]朱承山. 郢国故城出土的两件陶量[J]. 文物, 1982, (3): 78.
- [27]刘庆柱, 李毓芳. 秦都咸阳遗址陶文从考[J]. 考古与文物丛刊, 1983, (2): 75—79, 59.
- [2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J]. 考古与文物, 1983, (3):

- 12—19.
- [29]陈全方. 周原出土陶文研究[J]. 文物, 1985, (3): 63—75.
-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新乡市博物馆等. 河南新乡县丁固城古墓地发掘报告[J]. 中原文物, 1985, (2): 1—10.
- [31]罗福颐. 封泥证史录举隅[J]. 古文字研究, 1985, (11) 94—105.
- [32]秦俑考古队. 临潼县陈家沟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5, (1): 19—22.
- [33]徐锡台. 西周陶文试释[J]. 人文杂志, 1985, (3): 91—93.
- [34]张松林. 郑州商城区域内出土的东周陶文[J]. 文物, 1985, (3): 76—79.
- [35]李孝定. 小屯陶文考释[J].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 1986: 305—335.
- [36]孙敬明. 齐陶新探(附: 益都藏陶)[J]. 古文字研究, 1986, (14): 221—246.
- [37]张松林. 郑州市西北郊区考古调查报告[J]. 中原文物, 1986, (1): 73—75.
- [38]张松林. 郑州商城内出土东周陶文简释[J]. 中原文物, 1986, (1): 73—75.
- [39]郑超. 战国秦汉陶文研究概述[J]. 古文字研究, 1986, (14): 73—75.
- [40]陈全方, 尚志儒. 秦都雍城新出陶文研究[J]. 文博, 1987, (4): 36—40, 62.
- [41]吕智荣. 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陶文考释[J]. 文博, 1987, (4): 64—66, 75.
- [42]黄盛璋. 商水扶城出土古陶文及其相关问题[J]. 中原文物, 1988, (20): 81—88.
- [43]乔志敏, 赵丙煥. 新郑馆藏东周陶文简释[J]. 中原文物, 1988 , (4): 11—14.
- [44]孙敬明. 潍淄流域的陶文[N]. 中国文物报, 1988-10-7 (3) .
- [45]李先登. 荥阳、刑丘出土陶文考释[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9, (11): 32—37.
- [46]牛济普. 河南陶文概述[J]. 中原文物, 1989, (4): 85—102.
- [47]李西兴. 淳化县发现西周陶罐上易卦数符管见[J]. 文博, 1990, (6): 33—38.
- [48]姚生民. 淳化县出土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J]. 文博, 1990, (3): 55—57.
- [4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制陶作坊遗址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 1991, (3): 33—54, 32.
- [50]葛英会. 古陶文释从[J]. 文物季刊, 1992, (3): 46—56.
- [51]何琳仪. 古陶杂识[J]. 考古与文物, 1992, (4): 76—81.

- [52]高明. 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J]. 学术集林, 1994, (2): 73—100.
- [53]徐锡台. 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数图形画研讨[J]. 考古与文物, 1994, (1): 52—56.
- [54]郑建芳. 郑国故城出土的陶量[J]. 中国文物报, 1994-8-28 (3) .
- [55]陈继揆. 篁斋论陶·序[J]. 文物天地, 1994, (5):12—13.
- [56] 陈伟武. 古陶文字征·订补[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118—130.
- [57]李学勤. 陈固陶区[J]. 学习与探索, 1995, (5): 138—139.
- [58]施谢捷. 河北出土古陶文字零释[J]. 文物春秋, 1996, (2): 57—61.
- [59]苏建洲. 战国古陶文杂识[J]. 中国文字新, 2000, (26): 183—188.
- [60]孙慰祖. 封泥的断代与辨伪[J]. 上海博物馆集刊, 2000, (8): 187—210.
- [61]李维明等. 河北怀来县大古城遗址 1994 年调查简报[J]. 考古, 2001, (11): 19—28.
- [62]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 平阴县博物馆筹建处. 山东平阴县古文化遗存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1, (5): 3—16.
- [63]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天津市武清县兰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J]. 考古, 2001, (9): 35—50.
- [64]徐在国. 古陶字汇·正文释文校订[J]. 文物研究, 2001, (13): 277—288.
- [65]焦智勤. 邺城战国陶文研究[J]. 古文字研究, 2002, (24): 323—331.
- [66]刘瑞. 1997—2001 年间秦封泥研究概况[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 (9): 16—20.
- [67]徐在国. 古陶文字释丛[J]. 古文字研究, 2002, (23): 108—120.
- [68]周晓陆, 路东之. 发现原始封泥[J]. 中国国家地理, 2003, (3): 112—117.
- [69]黄德宽. 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J]. 中国文字学报, 2006, (1): 1—17.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从资料的搜集、提纲的拟定，到论文撰写与修改，都得到了恩师徐在国教授悉心地指导，才使本论文得以顺利地完成。三年的研究生期间，在为文和为人方面，先生都给了我有益的教导。先生的学者风范，严谨的学术作风，为人真诚的品格，都使我受益终生。今天我所取得的成绩与先生的不倦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在此向我的恩师徐在国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年中，我得到了阚绪良老师、杨军老师、郝士宏老师、时兵老师、程燕老师等各位老师的指导和教诲，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会铭记你们的教导；三年中，我也得到了同门师兄妹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问题，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些都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转瞬之间三年已过，在这惠风和畅、燕舞莺飞的季节我将告别安大，为我三年研究生的生活画上完美的句号。我将去迎接人生中新的挑战，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我会带着你们的嘱托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在此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徐正磊.辟邪文化与汉赋创作中的尚奇思想[J].现代语文, 2008, (28): 30-31.
- [2]徐正磊.试论《项羽本纪》中的“敢”为“能”义[J].教师教育科研, 2009, (6): 176.

殷商与西周陶文研究

作者:

徐正磊

学位授予单位:

安徽大学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D158016.aspx